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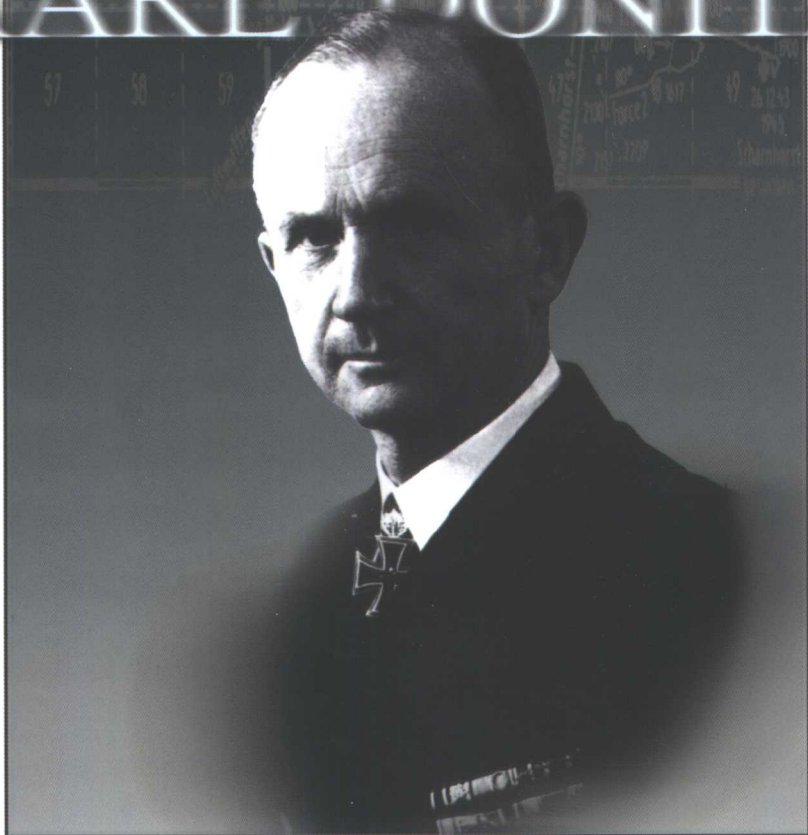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邓尼茨元帅

战争回忆录

〔德〕卡尔·邓尼茨 著
王星昌 译

KARL DONITZ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

〔德国〕卡尔·邓尼茨 著

王星昌 等译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尼茨战争回忆录 / (德) 邓尼茨著; 王星昌等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5
ISBN 7-5065-4844-5

I. 邓… II. ①邓…②王… III. 邓尼茨—回忆录
IV. 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3880 号

图字: 军—2005—001 号

根据 Karl 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Bernard & Graefe Verlag Bonn 1997 年第 11 版译出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424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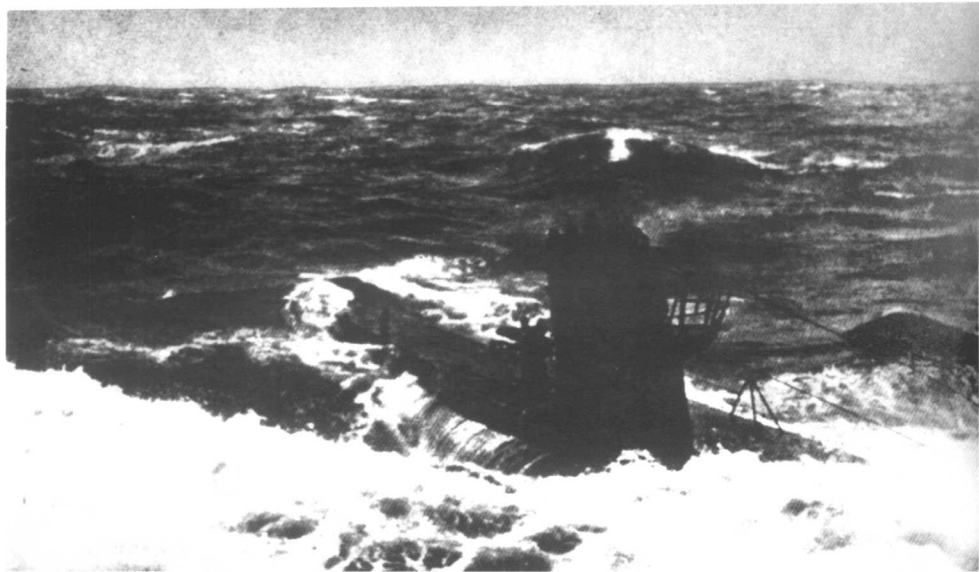
定价: 36.00 元



1917 年，邓尼茨在 U-39 号潜艇任值更官。



1945 年 5 月 23 日，
邓尼茨被英军俘虏。



大西洋中的德国潜艇。



德国潜艇用鱼雷击中一艘油船。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卡尔·邓尼茨（1891.9.16~1980.12.24）是纳粹德国海军元帅，军事家，纳粹德国潜艇部队奠基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1910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皇家海军，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德国海军潜艇艇长，指挥潜艇与英国护航运输队作战，后被俘。1919年获释回国。1920~1934年历任鱼雷艇艇长、支队长、巡洋舰舰长等职。1935年任纳粹德国新建第一支潜艇支队的司令。1936年任潜艇部队指挥官（1939年9月19日起改称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任海军总司令兼潜艇部队司令。1945年4月，受命兼任德国北部地区总司令。同年5月1日，按希特勒遗嘱任帝国国家元首兼国防军最高司令。5月23日，被英军逮捕。1946年9月，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56年刑满获释后，开始撰写本书。

本书原名《十年与二十天》，于1958年出版，至1997年已出第11版。邓尼茨在书中回顾和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海军战略，详述了纳粹德国潜艇部队的组建、训练、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叙述了德国潜艇部队在世界各大洋（尤其是大西洋）运用“狼群战术”实施潜艇战的各阶段战况，分析了德国潜艇部队在同英、美护航运输队作战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披露了当时德国最高领导层对海军建设和海战地位的不同观点之争。邓尼茨认为击败英国的关键在于切断其海上交通线，而最适合于执行这一战略任务的莫过于潜艇。他主张大量建造中、小型潜艇，对商船进行袭击战，破坏英国大西洋海上交通线。在潜艇的使用上，他强调把潜艇派到对方运输频繁而对

潜防御薄弱的海区活动，以取得最大的战果。在作战手段上，他主张采取“狼群战术”（即多艇集群作战），实施近距离夜间水面攻击。德国潜艇运用此种战术击沉英国大量船只，曾给同盟国海上运输造成严重威胁。此后，英美建立护航制度，加强反潜兵力兵器和反潜措施，使缺乏空中支援的德国潜艇遭到严重打击，德国的潜艇战最后归于失败。此外，邓尼茨还回顾了自己在希特勒死后以帝国国家元首兼国防军最高司令的身份组织政府，指挥东线德军抵御苏军，策划西线德军向英、美当局实行局部投降等方面的详情细节。为了说明问题，给自己的论点提供佐证，邓尼茨在本书中大量引用了德国方面和英、美方面有关的历史档案资料。显而易见，邓尼茨的这部回忆录对研究纳粹德国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战史，具有不可低估的参考价值。

必须指出，邓尼茨是积极准备和参与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德国战犯之一，深受希特勒纳粹思想的影响。作者在此书中，对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军队以及作者自身的战争罪行，做了不少开脱、吹嘘甚至美化，反映了作者顽固的纳粹主义立场。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鉴别。

后记是德国学者于尔根·罗韦尔为本书德文第7版写的，简述了西方学者1980年对大西洋战役的历史研究情况。

附录则是译者加的，介绍了纳粹德国时期各种武装力量和准军事组织的军衔、职称方面的一些情况，仅供读者在翻译或研究纳粹德国史资料时参考。附录内容均来自德文版有关二战史方面的出版物。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人员有：王星昌，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迪乙石，金柯元，金山石，孟伟宏，曹向前，韩文军，麻吉萍，彭庆安，徐晓彤，舒畅，许石芹，越美芳，海施泰，肖斫，夏明目，张童舒，杜拉斌，郭卫嫦，尚左琳，宋北辉，罗蒂明，任建树，章迈红，贾青天，刘纯燕，赵鲁赫，朱军，钟山布，李明德，孙达得，门杰，袁尚，黄要武，魏学兵。

目 录

第一章	引子	(1)
第二章	新的任务	(7)
第三章	集群战术	(15)
第四章	1935~1939 年的潜艇建造方针	(21)
第五章	1939 年至战争爆发时的关键性的几个月	(31)
第六章	潜艇战的第一阶段 (1939 年 9 月~1940 年 3 月 1 日)	(42)
第七章	“挪威”行动和鱼雷危机	(63)
第八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一阶段 (1940 年 7~10 月)	(85)
第九章	潜艇部队的组织和战争第一年的潜艇建造	(101)
第十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 (1940 年 11 月~1941 年 12 月) 贫困和四分五裂的一年	(109)
第十一章	1941 年 12 月 11 日前美国同我国的战争	(159)
第十二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三阶段 (1942 年 1~7 月) 在美国水域的战斗	(170)
第十三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四阶段 (1942 年 7~9 月) 打击护航运输队和远洋作战	(196)
第十四章	“拉科尼亚”号事件	(223)
第十五章	改进潜艇装备	(234)
第十六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五阶段 (1942 年 10~12 月) 与护航运输队作战规模的扩大和远洋作战行动	(240)
第十七章	受命任海军总司令,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看法和	

我与希特勒的关系·····	(265)
第十八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六阶段 (1943 年 1~5 月)	
从最大规模的反护航运输队作战到潜艇战的失败·····	(279)
第十九章 1943~1945 年我任海军总司令时的任务 ·····	(305)
1. 海军装备问题 ·····	(305)
2. 地中海战场 ·····	(317)
3. 海军领导职位和小型作战兵器 ·····	(326)
4. 大型作战舰艇问题及其在北方海区的最后作战 ·····	(329)
5. 黑海战场 ·····	(344)
6. 入侵诺曼底 ·····	(348)
7. 波罗的海战场 ·····	(353)
第二十章 1944 年 7 月 20 日 ·····	(357)
第二十一章 从 1943 年 5 月至战争结束时的潜艇战 ·····	(362)
第二十二章 国家元首 ·····	(384)
第二十三章 结束语 ·····	(423)
附 件 ·····	(427)
后 记 ·····	(448)
附 录 ·····	(460)

第一章 引子

1918年9月底，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潜艇艇长和施泰因鲍尔海军上尉（他因功曾荣获骑士勋章）各率一艘潜艇在亚德里亚海岸奥地利的普拉军港*准备启航。我们要出海协同作战，到马耳他附近海域等待英国穿过苏伊士运河从东面驶来的大型护航运输队，利用朔月时光在水面对其发起攻击。我们打算利用潜艇侧影小、不易被发现等有利条件，先从水面穿过英国的驱逐舰护航兵力，然后驶近护航运输队的核心，对多列商船纵队实施水面袭击。我们约定在西西里岛东南50海里、方位315°处的帕塞罗角会合。据我们所知，两艘潜艇协同作战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之前，潜艇一直是单独作战的：他们单独出航，单独行进，单独自卫以对付反潜兵力，并单独搜索和攻击敌目标。那时，潜艇的通信手段——无线电报还无法使潜艇实施协同作战。当时尚无短波和长波通信，潜艇一下潜即失去任何无线电联络。在水面状态通信时也必须要在两根桅杆之间架设一部天线，以便能用长波发报。但这种办法耗电量太大，而且通信距离也很有限。在发报时，潜艇处于半潜状态，处境非常危险，而且无法实施任何攻击。

1918年10月3日晚，我艇如约到达西西里岛东南的会合点，在那里等待施泰因鲍尔，但他却杳无音信。后来我才知道，由于修艇，他推迟了启航时间。

深夜1时左右，我艇值更官在指挥台上发现东南方向漆黑的天空

* 今属克罗地亚。——译者注

中有一个黑色的香肠似的庞然大物在蠕动。原来它是一个拴在一艘驱逐舰舰尾的系留气球。这艘驱逐舰就是所谓的“清道夫”^①，即英国护航运输队护航兵力的“开路先锋”。不久，我们发现在黑暗中蠕动的黑影越来越多，看见了另外一些驱逐舰和护航舰艇，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船队的庞大的侧影：这是一支满载货物的护航运输队，从东亚的印度和中国来到马耳他海域并向西航行。我艇悄悄地穿过了英国驱逐舰护航兵力，准备对外侧的那列商船纵队的第一艘商船发起攻击。突然整个船队转向，朝我驶来。这种突然改变航向的做法可能就是按预定方案沿“之”字形航线航行的一种方式。整个护航运输队这样按“之”字形机动航行，目的在于增加潜艇实施攻击的困难。当然，这就增加了我的困难；于是我急忙下令转向，紧跟在刚才我想攻击的第一艘商船的后面。突然我发现我艇正处于第一列和第二列商船纵队之间。于是我立即从这个位置对第二列商船纵队中的一艘大型商船进行攻击。一条巨大的明亮的水柱在那艘商船的前面升起，紧接着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时一艘驱逐舰劈波斩浪向我急驶而来。我急忙发出警报，下潜，并等待着深水炸弹的攻击。但是毫无动静。也许驱逐舰舰长怕误伤己方的船只，而未敢投放深水炸弹。

我艇从水下摆脱了敌护航运输队，然后小心翼翼地上浮，我独自趴在刚露出水面的指挥台上向外瞭望，发现护航运输队在继续西行。在我艇附近还有一艘英国驱逐舰，它就在刚才被我鱼雷击中而沉没的那艘商船旁边。我下令把水柜全部排空，让潜艇完全浮出水面，跟随在那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的后面，我企图尽可能利用黑夜对它再次实施水面攻击。然而黎明来得太快了，当我艇追上护航运输队时，天已经大亮了，我只得再次让潜艇下潜。现在，我打算在潜望深度实施水下攻击，但事与愿违。由于我艇（一艘B-Ⅲ型德国潜艇，曾在船厂进行过重大改装）失去平衡，艇内突然出现一片混乱；电解液外溢，灯光熄灭，我们在黑暗中迅速下沉。我们下面还有相当的水深，约2500~3000米。当艇下潜到60~70米深度时，我们便不敢让艇继续下沉了，因为这已是艇壳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了。我下令排空所有压载水柜，停车，然后倒车并急转舵，尽力制止潜艇继续下沉。这时能

千的值更官米森中尉用手电筒检查指挥台里的压力表。指针仍向右急转，潜艇仍在急剧下沉；最后指针在 90 和 100 米之间来回颤动，然后又迅速回转。排空压载水柜还真的起了作用。排空了水的艇体轻盈地上升，就像一根压入水中的木棍在解除压力后迅速上浮到水面一样。我打开指挥台的舱口盖环顾四周，外面已经大亮了。我艇位于护航运输队中间，驱逐舰和商船都挂上了信号旗，汽笛声此起彼落，商船已转向，并用舰尾炮向我艇射击；驱逐舰也向我艇驶来，并向我开火。当时情况非常紧张。我本想尽快地再次紧急下潜，但已办不到了，因为压缩空气已经耗尽，潜艇已中弹，开始进水。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结局，于是我下令：“全体人员离艇。”

我们解开了白天准备好的拴在甲板上的一大捆软木，每个艇员除穿上救生衣外尽量再携带一块软木。使我痛心的是已有 7 人阵亡，其中包括少尉机电长耶申。

潜艇沉没了，英国的护航运输队继续西进，我们漂浮在海面上。后来英国的一艘护航驱逐舰返回，把我们从水中捞起。

这样，就结束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航行活动。但最后一夜的战斗使我懂得了一个基本原则：潜艇在夜暗的掩护下从水面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是大有成功希望的。同一时间发动攻击的潜艇数量越多，局势对每一艘潜艇来说就越有利。因为舰船的爆炸和沉没会使敌人在黑暗中变得混乱，使担任掩护的驱逐舰失去行动自由，并由于大量诸如此类的事件而被迫分散行动。除此之外，出于战略和战术上的原因，需要采用多艘潜艇攻击一支护航运输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战曾取得了巨大战果，但自从 1917 年英国采用护航运输队的编队方法之后，潜艇战便失去了其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有了护航队，海洋上很少遇到货船；德国潜艇单艘地在海上游弋，长期一无所获。有时，突然遇到一大批商船，约 30~50 艘以上，但其周围有各种军舰担任强有力的护航，因此无法对其实施攻击。有时，一艘潜艇意外地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并对其发起攻击，艇长的意志异常坚强，几天几夜连续攻击，直至全艇官兵精疲力尽为止。攻击结果纵然有一二艘甚至更多的商船被击沉，但这

个损失数对护航运输队而言，只是一个微小的百分比！护航运输队依然继续前进。在通常情况下，它们再也不会碰到德国潜艇了。它们安然地抵达英国，并把大批生活资料和原料运回国内。

因此，对拥有大量舰船的护航运输队，必须尽可能使用许多艘潜艇来对付之。

我带着这种认识被押进了英国的战俘营。1919年7月我重返家园。当时，在新的帝国海军的基尔海军基地司令部里，有人问我是否想洗手不干了。我反问道：“我们不久就会有潜艇，您信不信？”

但这一点战胜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完全限制了我們。

他答道：“我当然相信，但并非大家都相信。我希望在两年之内拥有潜艇。”

这个回答给了我继续在海军服役的最后动力，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曾是一名出色的艇员。艇员们依靠自己坚强的信念和智慧在辽阔的海洋上独立完成的那次出色的远航，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留恋那同事间亲密无间的战斗情谊。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事业把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少不了谁。每个人心目中只有辽阔的海洋和任务，我们感到自己就像国王那样富有，对其他一切全然漠然置之。

因此我就问别人，我们是不是很快会有潜艇。

但事与愿违。德国一直受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在1935年之前，我们不许拥有潜艇，我也就没有与潜艇打过任何交道。在那段时间里，我曾当过水面舰艇的驾驶员、战术研究员、鱼雷艇艇长、鱼雷艇支队长，也曾波罗的海海军司令冯·勒文费尔德海军中将领的旗舰上担任过航海长，后来又担任过“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

我之所以提及上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在这几年中对水面舰艇战术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由于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这几年帝国海军相当虚弱。为了弥补这些弱点，使海军变得强大和富有朝气，我们进行了基本的航海、射击和战术训练。更重要的是，要认清和演练那些使弱者有较大希望迫使敌方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的战术情况。这首先是指夜战条件下的战术情况。它需要海军人员进行大量的训练和掌握

过硬的本领。即使在和平条件下进行这种训练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对处于劣势的一方来说，夜间作战比白天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夜暗的掩护下，他们可出其不意地对敌实施攻击，并能重新隐蔽起来。当时还不能用雷达来测定方位。在 20 年代，杰出的战术家海军总司令岑克尔海军上将成了组织部队进行紧张战术训练（尤其是夜战训练）的教官。

这几年我有幸在和平环境下使我的战术知识更加丰富和全面。这些知识对我在 1914~1916 年在黑海的“布雷斯劳”号军舰上取得的作战经验作了必要的补充。在黑海战场我们深深感到俄国舰队有着很大的优势。我们之间的战斗犹如猫捉老鼠一样，在每次军事行动之后，我们就设法重新回到能掩护我们的惟一“洞穴”——博斯普鲁斯海峡。此外，20 年代的经历对我在 1916~1918 年在潜艇上担任值更官和艇长时获得的作战经验也做了必要的补充；早在 1916~1918 年期间，我对使用潜艇发动攻击的战争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战争与平时期我在水面和水下、进攻与防御这两方面所进行的战术训练和积累的经验，对我后来从 1935 年开始的使用新式潜艇武器进行的训练是大有裨益的。

我认为，培养一名潜艇指挥官，不能只进行潜艇勤务训练，而应该让他经受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训练。同样，凡是担负护航任务和反潜任务的海军将领也应该有当过潜艇艇员的经历。只有这样，他才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去认识两种战斗类型的本质，才能避免盲目的探索而采取正确的措施。丘吉尔，一位罕见的英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对海战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也认识到上述问题的必要性，因此他在 1942 年委派马克斯·霍顿海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经验的潜艇艇长，后来又任战列舰舰长和巡洋舰编队指挥官）负责掩护和组织对英国生命攸关的大西洋护航运输队，于是他就成了我的劲敌。

我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结束了在非洲和印度洋的旅行后，于 1935 年 7 月到达亚德河口威廉港前沿的席林锚泊地。当时的海军大将、名誉博士雷德尔海军总司令来到了我的舰上。同一天，“卡尔斯

鲁厄”号巡洋舰舰长吕特晏斯海军上校（后晋升海军上将和任舰队司令，1941年5月在“俾斯麦”号战列舰上阵亡）也从南北美洲旅行回来。我们在我的舱室里向海军总司令汇报了航行情况，并对我们下次的出国航行提出了建议。按照海军总司令部当时的计划，吕特晏斯应率领“卡尔斯鲁厄”号再次到北美洲去，我则率领“埃姆登”号访问日本、中国、当时的荷属印度、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吕特晏斯提议，是否将我们对换一下，以便让“卡尔斯鲁厄”也能领略一下文化悠久的东方国家的风光。我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冯·米勒中校率领的“埃姆登”号的前身所进行的一些著名的战斗航行，“埃姆登”号在传统上就属于东亚地区。

使我和吕特晏斯感到惊讶的是，海军总司令严肃地说：“我的先生们，你们都别争了，你们两位都得离开巡洋舰。吕特晏斯将在海军总司令部担任军官人事处处长，负责为新组建的海军部队配备军官。你，邓尼茨，将去接管一支新组建的潜艇部队。”

这个决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与英国签订海军协定决定了这次指挥官的变动。我对这次调动并不感到高兴，因为原定的远东之行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组织均衡舰队的整个计划中潜艇只是很小和很不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我被安排到一个次要的岗位上了。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看法错了。海军总司令在1935年7月下达的命令对我漫长的生涯直至今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给我带来了能充实人生的一切：责任感、成功、失败、人的忠诚和尊敬以及必要的考验和痛苦等。

注 释：

① 之所以称这艘驱逐舰为“清道夫”，是因为它在护航运输队的前面沿“之”字形航线左右机动行驶，为其“清扫”航道，以迫使敌方潜艇尽早下潜，使之无法实施攻击。

第二章 新的任务

1935年6月18日德英双方签定海军协定。德国在该协定中承担的义务是，把海军装备限制在英国的35%以内。

这种自愿的自我限制是出于当时德意志帝国所处的地位。当时德国不得不屈从于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该条约使德国不断裁减军备，而战胜国却不履行条约中所承诺的裁减军备的条款。希特勒想逐步挣脱这个约束，于1935年3月16日宣布德国拥有国防主权。他为了使英国不会受到其他战胜国的反对，因此与英国就签订一项海军装备协定问题进行了谈判。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消除英国将来在政治上的对立情绪，因为通过自愿限制海军装备这一协定可以证明，德国不打算进攻英国。事实证明，当时国家领导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英国对一个欧洲国家的敌对态度主要是由其强权政策和世界经济观点决定的，即使它还没有受到这个敌对国家的海上威胁也是如此。当欧洲的另一个国家将要变得强大时，就会与英国人强烈的自信心、它的权力欲和它谋求经济优势的努力发生冲突。众所周知，英国的欧洲平衡政策的根源就在于此。尽管签订了海军协定和限制了德国的海军装备，上述这种情况在1935年以后仍然会显示出来。

英国在1935年接受希特勒的提议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德英海军协定，德国舰艇的总吨位只许占英国的35%，每一种类型的水面舰艇也要受此约束。只有潜艇的吨位可以达到英国的45%，必要时经过友好协商还可提高到100%。

根据英国海军在1935年所拥有的舰艇吨位，按照协定允许我们

建造的各种舰艇的吨位如下：

战列舰	184000 吨
重型巡洋舰	51000 吨
轻型巡洋舰	67000 吨
航空母舰	47000 吨
驱逐舰	52000 吨
潜艇（45%）	24000 吨

对于重新组建一支德国潜艇部队而言，上述的潜艇吨位数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已占 45%，但数量仍然是最少的。这是不难解释的。由于英国是一个岛国，其生存主要靠从海上运进生活资料和原料。此外，通向殖民地的海上交通线对维持英帝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因此，英国几百年来一直明确指出，保护海上交通线是英国海军的海上战略任务。这项任务只能由水面舰艇，而不是由潜艇担任。可想而知，由于潜艇在水面极易受到伤害（如火炮的攻击），航速慢，观察高度低，视界小，它不适合担任上述任务。然而潜艇却是一种特殊的战术进攻武器^①。英国当时还没有想像的对手，不需要在一场军事冲突中用大量的潜艇去破坏敌国的海上交通线，因而英国海军也就不需要有较大规模的潜艇部队。因此，英国潜艇在 30 年代发展缓慢，数量很少，例如仅相当于法国潜艇数量的三分之二左右。（1939 年英国拥有潜艇 57 艘，相反，法国却有 78 艘。）所以在英国海军中潜艇只起次要的作用。尽管英国允许德国的潜艇建造吨位可达 45%，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可达到 100%，而不是像其他的水面舰艇那样只达到 35%，但从上面的吨位分配来看，实质上数量还是相当少的。因此，这些数量的潜艇在德国新组建的均衡海军中也不能成为重要的因素。

对此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些海军强国于 1936 年在伦敦签订了一项完全符合英国愿望的关于军事上使用潜艇的议定书^②。根据这项议定书，潜艇要拦截和击沉商船时必须像水面舰艇那样在水面行驶。即使商船装备有“只用于自卫”的火炮，也不能改变这一规定。商船仍可按国际法的规定享受应有的保护。这就意味着潜艇必须按照捕获法^③浮出水面拦截和搜索商船。